

关于人口红利与 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评述

王 向 聂 鹏^{*}

摘要: 改革开放 30 年,人口结构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近来备受瞩目。“未富先老”是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最新文献回顾发现,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性、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缺乏,是造成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助于作出科学判断。

关键词: 人口红利 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结构 未富先老

一、引言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1978 年的 300 美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6 144 美元^①,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通过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控制住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更是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年龄结构方面 0~14 岁人口占 16.60%,比 2000 年人口普查下降 6.29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26%,比 2000 年人口普查上升 2.93 个百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比 2000 年人口普查上升 1.91 个百分点,而且 8.87% 的老年比例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 2000 年进入老龄社会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

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和“未富先老”现象,预示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由充足的劳动力所导致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人口红利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什么?在二元经济中,剩余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二元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即将到来,以及转折时期有多长?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密切相关,如何谨慎应对,关系着中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准确、合理地判断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进而深化认识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不管对于政府决策,还是企业和劳动者选择,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不断,为了清晰认识这些争论,以及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文献梳理。与已有相近研究不同,本文从“未富先老”的争论引出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而这两个问题是人口结构转变的两个侧面,因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蔡昉,2010)。然而,已有研究对此没有足够重视,而是偏重于刘易斯转折点争论的总结(刘钧,2011;李天

^{*} 王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wanghsiang2012@163.com;聂鹏,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npeu@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次产业动态协同发展机制研究”(项目号:10ZD&027)的资助。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1 月 18 日的公告计算得到,国家统计局“2012 年国民经济发展稳中有进”,http://www.stats.gov.cn/tjfx/jdxf/t20130118_402867146.htm。

祥、朱晶 2012)。所以,本文是对已有相近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二、中国“未富先老”了吗?

中国还没有进入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其人口结构已经快速老龄化,这种现象被称为“未富先老”。“未富先老”严格的概念界定是什么?中国真的未富先老了吗?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邬沧萍为了让全社会对快速到来的老龄化未雨绸缪,最先提出了“未富先老”的概念。社会各界普遍把中国经济还不富裕、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特征称作“未富先老”,即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邬沧萍等(2007)认为“先老”兼有人口结构“增龄的过程”(人口平均年龄提高)和“老龄化的状态”(人口进入老年型,超过人口老龄化标准)两种含义,“未富”则体现在中国人均 GDP 和财富积累较低、养老资源匮乏、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三个方面,这些特点都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经济学家蔡昉(2011)认为“未富先老”不能仅理解成人口结构的变化,“未富”指的是中国人均收入还处在低水平上,劳动力素质和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有优势。“先老”指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渐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总体上指的是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蔡昉 2010)。邬沧萍等学者基于人口学,综合考虑了多种社会维度,而蔡昉主要是从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和中国的经济结构方面分析,但是他们都认可中国当前“未富先老”的特征。

然而,李建民(2007)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能反映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老龄化社会不等于老龄社会,老龄社会指的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实质制约的状态,可以通过“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老年人口负担比超过少儿人口负担比”、“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三个标准判断: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到 2030 年才会关闭。他在对比相同老龄化程度时的人均 GDP、产业结构时发现,200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当时的英国(1930 年)、德国(1930 年)、法国(1864 年)、意大利(1927 年)等国。因此,从经济发展前景而言,“未富先老”也是个悬疑:李建民(2007)主张“即富即老”,认为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未备先老”,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应对机制的缺乏。乔虹(2006)也认为,未来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劳动力继续释放和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将有利于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中国不会未富先老。穆光宗(2008)将“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视为对立统一的关系,认为它们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做大蛋糕”的经济效益和“分好蛋糕”的公平问题等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二者相辅相成。

不管是静态视角,还是动态视角,中国人口结构已经老龄化和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未富先老”问题的讨论促使社会各界思考中国当前面临的日益紧迫的社会养老及其相应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通过“未富先老”可能存在的缺口,加深人们对经济持续增长重要性的认识,促进社会各界积极思考如何使人均收入适应于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预计将出现上升趋势,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是否会过早地到来,都是极其重要、广受争论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关系着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以及如何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蔡昉 2012)。

三、人口红利的存在与持续

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下降,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老龄人口比重将提高,会增加社会负担成本,人们担心,人口红利持续下降或消失,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什么是人口红利?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哪些重要条件,这种贡献还能持续多久?关于这些问题,已有研究还没有对相关文献进行清晰总结,尤其是对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方面的关注不够(王学义、徐宏 2009)。

(一) 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国外学者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首次使用的概念(Mason,1997;Bloom and Williamson,1998),1998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之后被国内研究者所熟知和使用。

一般而言,人口红利指的是人口转型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由于分析视角的不同,研究者们对它的定义也众说纷纭。结构论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较低

的幼年 and 老年人口比例、较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即“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局面(王学义、徐宏 2009; 于学军 2003); 因素论者强调,这种人口结构形成了利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储蓄、技术等要素(钟水映、李魁 2009); 数量论者则主要从可以量化的角度来界定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陈友华 2005)。不过,学者们都认同人口红利应包含劳动人口比例较大和抚养负担较轻两种因素,因此,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概念为:随着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在这种人口结构持续期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以及较轻的社会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王学义、徐宏 2009; 蔡昉 2011)。

(二) 人口红利的实现及其条件

人口红利对经济是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此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分析。Williamson (1998)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史的角度,通过对比 1870 - 1913 年期间欧洲和北美 17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发现新大陆人均 GDP 增长率比欧洲国家高 0.47 个百分点,这种差别中 90% 以上源于新大陆的人口结构优势;在研究东亚奇迹时,学者们也发现人口转变对经济有显著的影响,整个东亚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贡献了 1/4 ~ 1/3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8)。早期研究者蔡昉和王德文(1999) 估计中国经济增长中 23.71% 是由人口红利的贡献,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 GDP 来自于人口红利,其他学者的估算虽然没有这么高,但是人口红利也贡献了 15% 和 10% (王丰、安德鲁·梅森 2006; 陈友华 2008)。尽管他们都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人口结构优势的具体度量上,还存在分歧,国际上通常使用实际抚养比——有效生产人口与有效消费人口之比的变动来衡量,其中有效生产人口由加权计算历年劳动生产率得到,有效消费人口由加权计算历年分年龄消费得到(钟水映、李魁 2009)。郭琳等(2011) 则认为,应通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和比重的上升来表示,合理的衡量指标是人口红利实证研究最为核心的环节。

除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研究侧重于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这也间接证明了人口红利效应。在理论上,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 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较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经验研究也证实,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二者总和抚养比都与储蓄率存在显著负相关(Loayza et al. 2000)。中国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王德文等(2004) 借鉴 Leff 的模型并基于中国数据进行了估计,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都是负的;李克平(2005) 对中国高储蓄进行了分解,认为其中高达 16% 的家庭储蓄率源于较高的户均劳动力比重和较低的抚养负担。

很多研究者质疑人口红利的存在,或者否认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为人口红利的获得是有条件的。车士义和郭琳(2011)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以往对人口红利的研究没有考虑制度和结构因素,可能高估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较小;有的学者深入人口年龄和经济结构内部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在省际比较中,各省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统一,在动态上,人口红利也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黄润龙 2009);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储蓄效应非常有限,是经济增长吸收了就业,不是就业促进了增长,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学者们对人口红利效应的主要质疑在于人口红利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人口转变是动态的,它所带来的增长贡献不是永久性的(王德文等 2004),“两头大,中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而且“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的实现(刘元春、孙立 2009; 沈君丽 2005),发挥人口结构优势必须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劳动力得以充分就业,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必须不断提升。然而,现实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公共服务差异,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失业人员以及逐渐显现的大学生“知识性失业”,表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浅层次的人力资源也不利于人口红利的实现(刘元春、孙立, 2009; 沈君丽 2005; 汪小勤、王红梅 2007; 詹浩勇、杨毅 2010)。实际上这些质疑很大程度上仅仅指出了限制中国人口红利释放的约束条件,尚未出现否定人口红利效应的实证研究,反过来,即使人口红利肯定者也不否认这些约束条件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此外,蔡昉(2012) 认为改革开放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更高的条件,涉及到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成熟。

(三) 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久?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变,劳动力优势将消失,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较悲观者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6年达到峰值,2013年人口红利可能会变成“人口负债”(蔡昉,2006)。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还会持续10年(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5),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将有长达25年的持续期(1995-2020年),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4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持续期将是1990-2030年(田雪原等,2006)。另外,穆光宗(2008)从广义人口红利^①角度认为,为人口红利划定时间表本身就是错误,人口红利只有大小之别,存在时期没有长短之别。

虽然对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久尚有争议,但是普遍认为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即将关闭,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延缓和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时间。所以,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效应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并提出具体、有针对性的政策更为重要。目前,相应的政策建议集中在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市场制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以及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等(蔡昉,2006;钟水映、李魁,2009;张楚文等,2010),然而这些制度改革都必将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乐观者认为,受益于教育发展,中国正在收获人力资源红利,可以抵消未来人口红利消失的负作用,支撑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胡鞍钢、才利民,2011),然而现实是否如此,还需要经过实证研究的检验。

四、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来临

在人口结构迅速转变的背景下,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是同样要面对的问题,有些学者也将其看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蔡昉(2010)揭示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认为这两个过程具有相关和相似的变化特征;同时,很多学者将人口红利作为论证刘易斯转折点消失的佐证(周健,2010;张俊杰、张露,2011)。然而,刘易斯转折点基于不同的理论,不能与人口红利等而视之,从而对后者的判断也不能完全成为前者判断的条件。自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以来,刘易斯转折点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而其核心问题就是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下文的文献梳理也将围绕该争论展开。

(一) 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出^②

刘易斯转折点的概念源于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1954)。该模型把典型的发展经济体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个部门,最初,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或负数,而且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业部门可以在农村生存工资的条件下从传统部门吸收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在固定工资基础上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继续吸收农村劳动力,直到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工资水平开始上升,直至剩余农村劳动力吸收殆尽和两部门边际生产力相等,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Ranis和Fei(1961)发展了刘易斯的模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转为有限,农村劳动边际生产力开始上升,称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二元经济实现一体化时,称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混淆两个转折点,也是学界产生观点分歧的重要来源(卿涛等,2011)。

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对于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和制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然而,由于概念把握、判断标准、可得数据以及估算方法的不同,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来临,是与非之间仍然争论不断。为了更清楚把握争论重点,与已有文献将该争论划分为三种或者四种观点不同(张俊杰、张露,2011;王瑜,2012),本文只从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和未来临两类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分别从剩余劳动力数量、劳动工资上涨、“民工荒”、农民工福利等方面对争论双方的观点做了对照梳理。

(二) 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

自出现“民工荒”以来,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是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的支持者。蔡昉(2010)认为劳动力出现短缺和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看,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都阳和王美艳(2010)利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系统地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概率,根据模型估计和劳动力个体特征,推算出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4357

^①指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形成的人口低负担机遇,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创造财富的过程。

^②本文没有必要详述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理论,只是为文献综述提供基本的理论背景。

万,而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也在递减,“民工荒”不是暂时局部现象,而是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从农民工工资变化看,2002年工资增长率为2%~3%之间,2004-2007年,工资增长率一直在7%以上。

另外,吴要武(2007)利用统计数据和企业与劳动者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非技术工人工资显著增加,以及非正规就业规模减少。张晓波等(2009)通过长期调研发现,甘肃省贫困地区工资在农忙和农闲时都在大幅上涨。章铮(2011)突出强调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差异,在综合考虑统计口径、非农产业转移比的基础上,推算出40岁以下剩余农民工数量为448万~1807万,而且37岁以下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所以,只有农民工工资上涨,年龄较大、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民工才能向城市转移。这些研究都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提供了佐证。

然而,上述文献都暗含假定,此时的刘易斯转折点为第一转折点,而且判断标准比较简单、直接。卿涛等(2011)严格明确了两个转折点,将第一转折点称为“短缺点”,第二转折点称为“商业化点”,基于南进亮(Minami)的判断标准,对刘易斯转折点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和判断。他们更为详细的判断准则为:(1)越过短缺点之后,劳动边际生产力逐年增加,但是小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超越商业化点后,二者应该相等。(2)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不存在任何关系,则短缺点还没有到来;二者不相等,表示短缺点已经到来;二者近似相等,表示商业化点已经到来。(3)如果农业部门实际工资出现中度上升,说明经济已经越过短缺点,如果实际工资有个飞跃,说明越过了商业化点。(4)短缺点之后,工资差别拉大,如果工资差别趋于稳定,说明商业化点已经到来。(5)短缺点后,农村劳动供给弹性大幅度降低。根据这些准则,作者逐项进行了甄别,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短缺点”,但是还没有接近“商业化点”。

(三) 刘易斯转折点言之尚早

很多研究分析认为,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在剩余劳动力方面,孙自铎(2008)从农村劳动力数字不符、农业生产率还有上升空间、不能忽视兼业生产者和40岁劳动力四个方面质疑蔡昉对剩余劳动力的估算,认为剩余劳动力至少在1.5亿到2.1亿之间。侯东民(2011)从城乡全局视角,估计农业还存在1亿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工人和退休年龄限制,城乡剩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而且预计10年之内劳动人口规模还将继续增长,甚至到2050年剩余劳动力还可供10年消化。所以,短期内中国不会出现全面用工短缺的情况。对于“民工荒”现象,张宗坪(2008)从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孟昕(2008)从政府政策, Knight和Zhang(2010)从制度方面、章铮(2011)从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也揭示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与“民工荒”并存现象。

在工资上涨方面,很多研究得出了不同于蔡昉等人的结论。世界银行(2007)认为工资上涨只是从过低逐渐调整到合理水平,而且其他估算高估了非正式雇员的实际工资。刘伟(2008)基于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变化,发现劳动者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唐茂华(2008)从刘易斯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工资上涨主要是外生变化造成的,而不是劳动力供求变化导致的。宋世方(2009)研究发现,非农部门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部门工资并没有同步上涨,因此,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课题组(2011)的分析最为全面,他们从五个方面对现实数据进行了检验:一是农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基于已有研究估计还存在8000万到1.9亿农村劳动力剩余,认为蔡昉的估算忽视了转移出去的农民工并没有在城市落户;二是农民工相对实际工资并没有显著上涨,通过比较农民工实际工资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农民工工资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后发现,农民工实际工资没有更快的增长;三是农民工的支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仍然停留在非常低的阶段,他们的消费支出还集中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四是农民工的福利水平偏低,劳动时间长,工资被拖欠,居住环境差,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五是“民工荒”与经济周期波动、实际收入、地域结构、劳动力类型结构有关,不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征兆。尽管该课题组反对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但是“并不遥远”。

此外,由于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估计差距较大,从5000万到2亿不等,而且农民工工资上涨观察期短、样本小,难以做出确定的判断。为了避免剩余劳动力衡量的复杂性,汪进和钟笑寒(2011)利用大样本跨国数据,将农业劳动力比重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指标,通过人均GDP和其他控制变量回归发现,国际上刘易斯转折点显著存在,其大致的范围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4000美元之间。虽然,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进入这个区间,但是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同等收入下的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近年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有潜力可挖。另外,姚洋和张珂(2011)使用带有不确定阈值的

Truncated 模型估计了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认为“民工荒”的出现以及农民工工资的上漲并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而可能是剩余劳动力供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上文叙述,这里有几点总结:(1) 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展开;(2) 虽然严格的理论分析中,农业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固定低工资开始变化,被视为二元经济的转折点,然而现实经济中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段时期;(3) 统计制度不完善和数据缺乏,导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农民工工资估算的困难,数据问题仍然是未来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重要方面,此外,有的研究中混淆了人口红利与劳动力数量多寡,二者必须界定清楚;(4)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符合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的理论描述(汪进、钟笑寒 2011),也不能忽视二元经济模型本身的缺陷和适用性^①,对于刘易斯转折点肯定者主要是从二元经济纯理论出发,通过几个判断标准展开分析,而否定者往往更强调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复杂性和结构性特征,也就是后者是研究中最欠缺的。

五、结语

本文从人口结构转变的背景出发,在简单总结了关于“未富先老”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这两个更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文献梳理,前者争论的重点在于人口红利的释放是有条件的和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后者主要围绕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来临展开。对于人口红利问题,或迟或早都会消失,应采取哪些应对策略,充分挖掘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是主要的政策研究方向。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本文认为更多研究者还是相信中国仍然存在大量有待利用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

然而,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如何区分由政府主导的劳动者工资上升与劳动力供求本身推动的工资变化,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对于直接面向公共政策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从刘易斯模型与中国经济的适用性出发,在剥离特有的制度和结构性问题之后,可能更利于做出清晰和准确的判断。总之,对这两个命题的判断不能脱离中国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结构性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有的放矢的具体政策,才可能真正地挖掘出人口红利的后续潜力,并为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做好战略调整准备。

参考文献:

1. 蔡昉 2010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2. 蔡昉 2011 《人口转变如何影响“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比较》第52期。
3. 蔡昉 2012 《未富先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4. 蔡昉 2006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蔡昉、王德文 1999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6. 车士义、郭琳 2011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人口研究》第2期。
7. 陈友华 2005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11期。
8. 陈友华 2008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9. 都阳、王美艳 2010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0. 郭琳、车士义 2011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9期。
11. 黄润龙 2009 《“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现代经济探讨》第8期。
12. 侯东民 2011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人口研究》第5期。
13. 胡鞍钢、才利民 2011 《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8期。
14. 李克平 2005 《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变化的经济发展》,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论文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20680>。
15. 李建民 2007 《“未富先老”还是“未备先老”》,《人口研究》第7期。
16. 李天祥、朱晶 2012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经济问题探索》第6期。
17. 刘钧 2011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议综述》,《经济学动态》第7期。
18. 刘伟 2008 《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理论月刊》第2期。
19. 刘元春、孙立 2009 《“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第1期。
20. 孟昕 2008 《错判将对农民工的转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比较》第35期。

^①曹斌(2010)从基础不坚实、分析漏洞、概念模糊和难以应用等方面探讨了二元经济理论的缺陷。参见曹斌,2010《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和刘易斯转折点》,《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21. 穆光宗 2008 《中国人口红利: 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22. 乔虹 2006 《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参见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第138号 2006年2月14日。
23. 卿涛、杨仕元、岳龙华 2011 《“Minami 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24. 沈君丽 2005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南方人口》第1期。
25. 荣世方 2009 《刘易斯转折点: 理论与检验》,《经济学家》第2期。
26. 孙自铎 2008 《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经济学家》第1期。
27. 唐茂华 2008 《工资上涨: 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的契机——如何看待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界》第1期。
28. 田雪原、王金营、张学辉 2006 《老龄化——从人口赢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
29.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2004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第4期。
30. 王丰、安德鲁·梅森 2006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31. 王学义、徐宏 2009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天府新论》第2期。
32. 王瑜 2012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6期。
33. 汪进、钟笑寒 2011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 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34. 汪小勤、王红梅 2007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第1期。
35. 邬沧萍、何玲、孙慧峰 2007 《“未富先老”命题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人口研究》第7期。
36. 吴要武 2007 《“刘易斯转折点”来临: 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开放导报》第6期。
37. 姚洋、张珂 2012 《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了吗? ——基于省级数据的证据》,载于蔡昉、杨涛、黄益平主编《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8. 于学军 2003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39. 詹浩勇、杨毅 2010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红利辨析》,《当代经济管理》第8期。
40. 张楚文、胡汀、李沛 2010 《论“人口红利”衰退及其效用最大化》,《改革与战略》第8期。
41. 张俊杰、张露 2011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人口与经济》第4期。
42. 张晓波、杨进、王生林 2009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 ——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9期。
43. 张宗坪 2008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证伪——“民工荒”假象分析》,《山东经济》第3期。
44. 章铮 2011 《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中国农业经济》第8期。
45. 钟水映、李魁 2009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人口与经济》第2期。
4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课题组 2011 《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判断、趋势及对策》,《金融发展评论》第6期。
47. 周健 2010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西北人口》第4期。
48. Andrew Mason. 1997. “Population and Asian Economic Miracle.” *Asia - Pacific Population & Policy* 43(11): 1 - 4.
49. Bloom David and Jeffrey Williamson. 1998.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3): 419 - 455.
50. Knight John , Quheng Deng and Shi Li. 2011.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 585 - 600.
51. Lewis W.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 22(2): 139 - 191.
52. Loayza N. K. Schmidt - Hebbel and L. Servn. 2000. “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82(2): 165 - 181.
53. Ranis Gustav , and John C. H. Fei.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533 - 558.
54. Williamson Jeffrey. 1998.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 35(3): 241 - 271.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A Literature Review

Wang Xiang and Nie Peng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ith rapi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whether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disappearing , and whether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has come are of the high - profile research focuses. “Ageing before Affluence” is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shows that , it's more important to study the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constrain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differences of judgment on Lewis turning point are caused b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Lewis Model ,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lack of data. Therefore , only the researchers in future consider these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 can they make a scientific judgment.

Key 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Lewis Turning Poin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geing before Affluence

JEL Classification: J11 , O53

(责任编辑: 陈永清)